



胜利时刻

80周年

山河重光 民族自强

抗战胜利纪念日特刊

本版视觉 戚黎明 本版编辑 顾明

“天亮了”此起彼伏令人难忘

赋诗庆祝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全国欢腾。我父亲顾毓琇教授正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满怀豪情地赋诗曰：

沙坪坝喜讯日寇投降

抛却诗囊曾几时，惊人消息耐人思。八年涕泪愁何在，万里江山梦亦疑。忧喜童心闻捷报，敢忘慈训误归期。明朝巴峡楼船下，长跪萱闱诉别离。

我当年13岁，随父母在重庆沙坪坝，是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学生。8月份正是暑假，我们住在松林坡中央大学校长宿舍。那天父亲好像快吃午饭时从外面回来，告诉我家里，外面已经开始放鞭炮、敲锣打鼓了。讲的时候外面好像还不太热闹，我们跑出去看，越来越热闹了。沙坪坝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包括我们中学生，都自发地高举横幅彩旗和标语，结队游行庆祝，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天亮了”等口号此起彼伏，令人热血沸腾。许多老人饱含热泪，欣喜若狂，使我至今难忘！

一把龙泉佩剑

我祖父顾晦农先生英年早逝，留下六子一女，孤儿寡母，度日艰难。我祖母王诵芬太夫人坚韧刚毅，含辛茹苦，教子成才，六个儿子中出了五个博士。我父亲排行第二，14岁丧父，对他母亲非常孝敬。抗战时期，祖母跟随我大伯父顾毓琦先生（私立同德医学院院长兼同德医院院长）滞留在沦陷区的上海，与我们分离。抗战终于胜利，父亲急于回上海与我祖母团聚，于8月16日请辞中央大学校长之职。抗战开始后，他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国民政府，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战时

>>> 顾慰庆(时为中大附中初二学生)

父亲离开时非常匆忙，一切家事都要我母亲王婉靖处理。他临走时只对我们兄弟说：抗战胜利了，更要好好读书，在等待回上海前也不能荒废学业。



回沪后的全家福 郎静山摄于1945年

教育委员会主任长达六年多，之后任中央大学校长，公务繁忙，甚感劳累。他说：“以我个人之见，宁愿回到教书、研究的生活中去。”不料辞职获准的次日，又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

在回上海之前，他又接到了一项临时任务：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的身份，参加接受日军投降事宜。8月18日他飞往昆明，面见总司令何应钦和参谋长萧毅肃上将，次日又飞往湖南芷江，8月27日到达南京。他早年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国际上著名的学者，中英文俱佳，也得到美国人的尊重，这次受降典礼有盟军代表参加，他发挥了很好的沟通协调作用。这时他与萧毅肃将军一见如故，将自己在视察福建时购得的一把龙泉佩剑赠送。想不到多年之后，我的三弟慰华在美国与萧家子女良杰相识结婚，萧将军将这把佩剑送给女婿，说是“归还顾家”。

参与筹备受降

9月2日，父亲向何应钦请假乘火车回上海，“当晚面谒老母，令老人家

惊喜万分”。同时与我伯父母、姑母、小叔父团聚。9月5日，他返回南京，参与筹备受降。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受降典礼。日军代表冈村宁次正式呈送降书。

1945年9月12日，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政府成立，父亲正式就任教育局局长。后来他回忆说：“上海市政府辖区已扩大到整个上海地区，包括曾拥有所谓治外法权的英法租界……”“身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面临着为四百万人民提供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任务……如此多的旧校需要维修重建，如此多的新小学校将在城区和乡村建起，在上海市民的热情支持下，这一切均得以实施。”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专业，在交通大学担任兼职教授，讲授电机和运算微积分两门课程（之后江泽民同志成了他的一名学生）。

边等待边读书

再说在重庆，父亲离开时非常匆忙，一切家事都要我母亲王婉靖处理。他临走时只对我们兄弟说：抗战

胜利了，更要好好读书，在等待回上海前也不能荒废学业。

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大哥慰连、我、小妹慰文、三弟慰华、四弟慰中和1945年3月在沙坪坝刚出生还没有断奶的小妹慰民，搬到了重庆市区通远门嘉庐九号抗战初期租住的房屋。

暑假过后，母亲命我大哥和我回到沙坪坝，在中大附中住校读书。这时我大哥升入高中一年级，我升入初中三年级。我们每周六下午乘郊区汽车回重庆市区，周日下午返沙坪坝学校。我们兄弟在青木关中大附中分校读书时，父母就曾叫我们住校，在山沟里过着“大后方”艰苦的集体生活。

登船重返上海

1945年10月，母亲终于等来了船票，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在重庆朝天门登上轮船，沿长江奔向上海。

船行十多天终于到达上海。我们一家人住进了永嘉路623号父亲已租好的房屋。住下不久，父亲送我们兄妹五人都进了南洋模范中学和小学。

我出生在上海，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到了北平，那时父亲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我在清华园度过童年。“七七事变”后经上海、香港到了重庆，对上海印象不深。这次回来，看见美丽繁华的大上海与山城重庆确实大不相同，非常兴奋。但不久，眼见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是靡靡之音，许多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上海人说是“烂水手和咸水妹”，我感到这种现象与我们号称“四强之一”的中国很不相称。

此时在上海大概是在虹口区虬江路一带也出现了许多地摊。许多日本人变卖衣服、毛毯等。我母亲在小姨母陪同下给我买了一条绿色薄军毯，已跟随我整整七十年，走南闯北，至今还没有丢掉。

我在安乐邨经历的抗战胜利

落户上海

我父亲童寓是沈阳人，1925年清华学堂毕业，赴美留学。毕业后赴欧洲访问，于1930年9月由美国回到家乡沈阳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1931年日本在沈阳策划“九一八事变”后，举家避难到北平。同年，他应清华同学陈植邀请加入陈植、赵深在上海组建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至此，我们全家就在上海落户了。1933年12月，我在上海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于1938年就离开上海到重庆、贵阳等地建立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开展业务。1939年冬到1940年春，父亲经越南、香港返回上海与我们团聚。然后又去重庆、昆明等地，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了许多建筑。母亲关蔚然则带我

恨之入骨

1938年，母亲和我们由法租界的林肯公寓搬入位于胶州路康定路口的安乐邨7号。安乐邨位于康定路818弄，是个弄堂，有40户人家，鱼龙混杂。当时有少数日本人住在安乐邨，也有自由职业者（如教育、科技、医生、记者等），有汉奸，也有抗日分子。多数是生意人。我们就是在各种人中间生活的。他们住在二楼，我们住在一楼，一直到1947年我们全家搬至南京。在安乐邨时，我们小朋友经常在

>>> 童林夙(时为延平路小学毕业生)

当时有少数日本人住在安乐邨，有自由职业者（如教师、科技人员、医生、记者等），有汉奸，也有抗日分子，多数是生意人。我们就是在各种人中间生活的。他们住在二楼，我们住在一楼，一直到1947年我们全家搬至南京。

一起玩，弄堂里有一个日本小孩，想和我们一起玩，但是大家都不愿意，都排斥他。有一天弟弟哭着跑来对我说日本小孩欺负他，因为日本小孩一定要和我弟弟玩，我弟弟不愿意，日本小孩就欺负他。我一听就火了，立即跑去和日本小孩理论，然后我和日本小孩打起来了，我把他推倒在地。日本小孩爬起来就哭着跑了。我还在那里没走，没想到小孩向他父亲告我打了他，他父亲就恶狠狠地跑过来要抓我。我一看这情况，撒腿就跑，好在那个日本鬼子穿的是木屐鞋，跑得没我快，但差一点被他捉住，最后被我逃掉了。当天我不敢回家，在马路边流浪一夜。第二天我偷偷回到家里，见了妈妈，将情况说了一遍。可是我偷偷回家的事还是被那个日本鬼子知道了，他到我家当着母亲的面将我打了一顿。母亲由于害怕被人告状说我们是抗日家属而被抓到宪兵司令部，因而没有什么行动，只是对那个日本鬼子说小孩子打架，大人不要管。但是

日本鬼子才不听呢，对我照打不误。事后，我在床上躺了两天才缓过来。从此，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的。

扬眉吐气

1945年8月15日一早，我们就得到日本要投降的消息，大家特别高兴。一时鞭炮齐鸣，激情呐喊，场面确实激动人心。我那时得知弄堂里那个日本人要跑掉，机不可失，立即跑到日本人住的地方用上海话大喊：“东洋乌龟出来！”连喊几遍，日本小孩出来了。他们正准备离开安乐邨，我上前一步，抓住小孩的衣领将他痛打一通，一面打，一面喊：“你们也有这一天。”这时小孩母亲到我母亲面前告状我打她小孩的事，我母亲冷冷地对她说“小孩子的事，大人不要管”，把她顶了回去。那个日本鬼子始终没有敢出来。围观的人看见我都鼓起了掌，说：“打得好。”我这时才感到扬眉吐气。当天中午，那家日本人就搬离安乐邨不知去向。

搬至南京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和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父亲应邀代表无党派人士参加会议，但和谈没有结果，内战再起。抗战胜利后，父亲和母亲通信较多，有时父亲的朋友路过上海都会到我们家看望我们。1946年，父亲所在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返回上海，父亲与我们团聚了。但是父亲随即赴南京负责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在南京的工程项目并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所以在上海时间不多。于是父亲在南京亲自设计盖了一所房子，请当时有名的营造商承建并请我们兄弟三人到南京参观他设计的房子。由于父亲没有多少钱，又不准营造商赠送房子，所以房子较小，有点“寒酸”，遭到我们三兄弟一致否决，然后向母亲汇报说“房子太小，不行”，哪知母亲只是一笑了之。房子于1947年建成。我们离开上海搬至南京，终于和父亲能长期在一起生活了。

我们一家对全国来说虽然只是沧海一粟，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如果全国每个家庭都在抗日，日本必败无疑。任何侵略者也会和日本一样，有来无回。历史是不能忘记和篡改的。

内容支持

《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民间影像》(同济大学出版社)